

Distant Shores: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 By Melissa Macauley. Princeton, NJ and Oxford, Eng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viii + 362. \$39.95/£30.00.

熟悉明朝嘉靖(1522–1566)後期至萬曆(1573–1620)前期中國海洋史的人，經常會接觸到甲子洋、河渡門、馬耳澳、關望港、南洋港、田尾洋，還有南澳(島)等地名。這些地點都在廣東潮州沿海或海面，要不然離開潮州府也不遠；其實它們距離後來用「汕頭」這個名字開闢為通商口岸的港口也很近。但是在十六世紀時，附近一帶海盜肆虐，而知名海盜就有吳平、林道乾、林鳳等人。其中，吳平是福建省詔安縣梅嶺人。《潮州府志》記林道乾是潮州惠來人。林鳳，原籍潮州府饒平。林鳳、林道乾都從潮州出身；而福建省東南端的詔安縣與廣東省潮州府根本是緊鄰。十六世紀以來，潮州一帶多盜，其實是個普遍印象。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一般人的認知卻是潮州人擅長貿易，在中國大陸沿海與東南亞地區都產生很多成功的商人。這樣的一個形象的翻轉改變，自來廣受注意。研究者也不乏其人。

這本書探討潮州人的歷史，自然涉及潮州人的海外移民史。它不僅論述潮州人在本鄉、本土與寄居、移居所在地的發展，更著力於海內外潮州人所建立的網路，以及透過網路而在不同端點上交互產生的作用。這是很有意義的創新。作者 Melissa Macauley 將海內外潮州人的活動領域合起來稱作「海洋潮州」(maritime Chaozhou)。

Melissa Macauley 的新著 *Distant Shores: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 (以下暫譯為《遙遠的海岸》) 為潮州研究這個主題注入一些新鮮而重要的說法。作者說《遙遠的海岸》是在全球脈絡下的地方研究 (This is a local study in a global context, 頁4)。簡單地講，就是從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角度，深入研究生活於潮州本地與旅居和移民在外的潮州人，藉以說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前，潮州人在東亞經濟上的重要角色，以及這種情況形成的歷史根由。

全球史的認知必然涉及本地人與外來者、客居者與當地人的互動。作者提醒讀者：在接觸/相遇(encounter)時，文化因素不只由強者傳遞給弱者，或說由核心推向邊緣，而是相互的(頁4–5)。實情細膩而深邃。這是很好的態度。試想：航海家不就是早期最可能與其他民族遭遇的人嗎？不管是意外還是需要，他們彼此的互動與學習不就是很自然地在進行嗎？雖然航海家以外的人群

彼此遭遇與互動的當下，確實會帶進來己身文化的考量與矜持，不過自然的交流也還是默默地發生。

十八世紀中葉起到二十世紀中葉這段期間，潮州人大量往海外發展，也往中國海岸的其他地方活動。潮州人旅居者 (Chaozhou sojourners) 活躍之處既包括了中國本身的上海與香港，也伸展到海外的東南亞、暹羅灣上的曼谷與柬埔寨、西婆羅洲、南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不過，他們始終與原鄉維持緊密的關係與頻繁的來往。這樣一個互動不已的空間領域，雖然未被測繪，實則是一個潮州人的共同生活領域。靠海、傍海，通過海路交通加以連結，因此可以稱之為「海洋潮州」。而這些潮州人也就是跨地域的家族成員。其實，穿越不同的帝國、殖民地、蘇丹國，還有大洋大海，這些潮州人不只跨地域 (translocal)，他們的集體經濟與社會生活也是跨區域的 (transregional)。

Macauley 引用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的觀點，認為臨海的邊界其實不光是地理上的空間，「它更像是一種社會的形式，而不是一個區域」(It is a form of society rather than an area, 頁 13)。¹ 因為它隨著人群的移動而變化。然而國家則將之視為疆界的邊緣，固定在那裏。潮州人就是這樣，他們並不把大清國家所認定的不歸國家管轄、或是國家管轄不到的「外洋」看作是不可進入的禁區，反倒是把外洋看作是地理上聯繫著故鄉「領域」與持續擴張的、用來抽取經濟利益之聚落間的海洋通路。從社會而不是從國家的視角來看，邊界移動其實是一種人群向外擴張的過程。潮州人先到了港口城鎮 (port polities, 也可譯作「港市政體」，例如香港、上海、西貢、新加坡、曼谷，頁 14)，然後將他們的邊界往他處移動。在潮州人海洋世界的拓展上，潮州故鄉的主港汕頭 (或者更早的柘林、樟林)，比起那些遠離故鄉的港市所發揮的作用來說，反而沒那麼大。而當 1891 年之後，因為中國政治秩序的解體，海外的港市反而成了投資、定居與金融操作的避風港。

作者以海內外潮州人活動的世界為海洋潮州。她同時指出在海洋潮州網路上來來往往的人群，各自環繞著共同的親友族人的紐帶，可以說是一種「跨地域家族」(translocal families) 的情況。這種往來活動，不只涉及到人口的移動，更包含了資本、觀念、商品，乃至於疾病的流通，可以說是存在著一種跨地域機制 (translocalism)。潮州人在數百年前就開啟了這樣的機制。潮州人通常去同

¹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Huntington, NY: R. E. Krieger, 1976), p. 205: "The West, at bottom, is a form of society, rather than an area."

一個地方謀生，與同族、同鄉相聚居住，既與當地的同鄉來往，也維持與故鄉親友的聯繫。早先人貨的往來與信息的交換依賴帆船與信件，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輪船和電報讓他們更加方便聯繫，甚至年年返鄉探親也不成問題。

作者多次提及本書是在全球脈絡之下討論地方歷史，但她也強調不管是移民還是旅居，離鄉在外的潮州人與原鄉的潮州人通過跨地域機制，多方面影響彼此的觀念與生活。在故土或他鄉承受到的「全球化」文化，即使受用者未必自覺，甚至可以說是習焉而不察；可是人來人去，信息互通，認知、受用都交纏在一起。發生在中國某個村落的事情，有可能影響到兩千八百公里外的馬來半島，反之亦然。兼從潮州本地與海外，也就是觀察完整的海洋潮州，更能對全球史建立起適當的理解。

Macauley 認為《大分流》的作者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聚焦於上海，² 因此看到了「大分流」下，中國人因為未能建立殖民地以擴張版圖，藉以容納增加的人口、維持繁榮，致使中國成為生態災難與經濟落後的犧牲者 (頁 6-7)。

然而，Macauley 認為：若是他把眼光南移，看看 1750 年後的潮州、閩南或廣州，故事或許會不一樣。潮州人與福建人在東南亞的殖民，其宏偉的程度並不亞於英國、西班牙、法國、荷蘭、美國和日本的總和。——旅外潮州人透過僑匯，不時將資金或資源送回家鄉資助親友，也與歐美殖民者的行為頗為相似。旅外的潮州人在經營農場或者林場、礦場時，也可以常態性地從原鄉獲得勞動力的供給。而原鄉的居民也可以由糧食生產轉作甘蔗或罌粟這類經濟作物，或者擴大經營的規模，在海洋潮州銷售。於是，經濟上以及社會上，留居原鄉的潮州人與移居在外的同鄉在此 (十八世紀五十年代) 之後也就合流了。作者於是引用同時代歐洲人的話語，說這些海外潮州人根本就是殖民者 (colonists)。

貫穿全書首尾的想法之一就是：由於潮州人 (其實也包括閩南人、廣府人、客家人等) 的海外移民，構成一個包括海外的潮州人世界，共同構成一個海洋潮州。因此，至少就東南中國而言，它並沒有陷入《大分流》指出的「生態危機」所構成的泥淖。就解決「多餘的」人口這件事來說，潮州人 (或者華南居民) 與歐洲人一樣，藉由殖民地或者不包含主權在內的相同領域，達到相同的效果。就此點而言，作者要說是「大合流」，而不是「大分流」。此點可以聊備一說。

²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從歷史來看，中國政府除了維持朝貢關係之外，絕少介入本國人的海外發展。海外華人的奮鬥，利用的是非正式制度，如同鄉組織、秘密社會、商業網路等。因此，歐美人士靠正式體制建構殖民機制成本高，華人創造經濟利益的成本低。當然，這並非有意的設計，而係基於血緣、地緣的跨地域網路有以促成。

不過，作者 Macauley 顯然也認為若說海外華人的活動是一種建構殖民地的行為，卻又沒有母國政治力介入，多少有些奇怪。因此她也說：用「殖民機制」(colonialism)來說華人的海外經濟、社會發展，遠不如使用「領域動力」(territorial dynamic)一詞來得恰當。她不採用傳統上賦予「領域」(territory)的定義，而引用 Robert David Sack 的主張，把「領域」(territory)當成是「社會力量在地理上的基本表現」(primary geographical expression of social power, 頁12)。這涉及了「用來被動、主動或者控制資源的空間策略」(a spatial strategy to affect, influence or control resources)，「這是一種空間行為的樣式」(It is a form of spatial behavior, 頁12)。

簡單地說，講領域、不講直接殖民，其實就是要避掉主權的問題。潮州人或者任何海外華人在海外經營事業，沒有取得「領土」，但還是實現領域的擴張——也就是掠取資源、攻奪商業至尊，而不用建立殖民國家的作法。

支配領域常常要靠暴力，例如不同原鄉團體在暹羅灣一帶的爭鬥。不過，重點也不在此。大量中國人的跨地域移動所形成的空間動力，補足了既有的居住秩序與政治權威。當其他國家努力從事家邦建設 (state-building) 之時，中國移民卻創造了非國家性的領域擴張。不用建立政權，這些華人的領域策略就成為分配資源、擴大個人及群體利益的作為。東南亞華人沒有建立政權，但支配了他們領域內的資源與商品的生產！

海洋潮州所看到的華人非正式制度容易適應調整，花費不多，永續能力強，至今仍然能繼續運作。反觀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美國與日本人的殖民威權，早在許久以前就已被掃到被醜化的歷史垃圾桶裏。順著作者的論理來看，潮州人的成功確實有其道理可說。

全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四章，前三章其實講了三個主要的發展：(一)十七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政府的系列征伐，強力削減了潮州沿海的人口。這助長了械鬥文化、養成了一種遊歷(走方)型的「鄉民知識份子」階級。這些人對朝代政權的不在乎，凝固成某種宗教性的意識型態；(二)聚焦於暹羅將領鄭昭 (Taksin, 1734–1782)。他的父親來自中國廣東澄海，母親為暹羅人。1767年鄭昭大敗入侵暹羅的緬甸軍隊，進而成為暹羅國王。作者認為鄭昭的成功獲得

潮州鄉人的鼎力相助。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將暹羅灣沿海一帶的港市政體，轉型為潮州人的經濟勢力範圍；(三)潮州鎮總兵方耀在1869–1873年間的「清鄉」，肅清由會黨兄弟支配的潮州村落。

作者把1870年前後，方耀在潮州綏靖鄉間的強硬作為看得很重要，認為正是聯繫著前近代與近代的核心事件，因此也作為結合本書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主要事件。擔負著控制該地區的軍事，甚至於民政的控制責任，方耀屠殺了成千上萬的「三合會成員」、海盜與走私客，驅使大約八萬個人逃離到上海與東南亞。此一軍事行動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加速了該區域的人口外移，也創發了一種軍事化「本鄉性家邦建設」(provincial state-building)的形式，使得有力量的家族把自己包絡起來，全心投向經濟活動領域(頁15)。這個赤裸裸的殘酷行動，暫時鎮壓了一個前此難以治理的區域，也方便潮州事業有成的商人加入遍及東南亞正在興起的資本家體系。方耀治潮的衝擊持續甚久。甚至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地的共產黨員還可以把這個先前所留下來的、充滿怨恨的大水庫，導引到階級對立與革命情懷的意識形態。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潮州本地發生的事情，透過海洋潮州的網路，對外產生影響。作者說：方耀清鄉的餘波也激盪到上海與東南亞，即使當地人並不知悉方耀清鄉的一切。舉例而言，新加坡的犯罪情況就激烈增加了，迫使英國殖民政府必須進行遍及整個海峽殖民地的司法改革，以資對付(頁15)。本來英國當事者也不知曉這波犯罪浪潮的來由，直到1873年才在一次調查中揭露了這樣的殖民地的社會動態。就這樣，我們見識到某個地方性事件跨越政治邊界的迴響。方耀的軍事猛擊，使得海洋潮州原本已在發展中的趨勢更為加速與強化，而在潮州本地與馬來半島英屬海峽殖民地兩塊表面上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地理空間，滋養出某種糾結在一處的「家邦營造」樣式。兩處地理空間上的表現都反映了同一個歷史事件，還都分享了共同的轉型後果。在初期發展階段，兩個「家邦」(states)——一個殖民地式的、一個本鄉式的——都設法去馴服與壓制同一群的外來客，而這些人老早以來就脫韁於政府的威權之外。這兩個「家邦」就這樣走著走著，走到了轉型後的自己。糾結在一處的「家邦建設」是一個跨越國家(transnational)的過程，在其過程中，那些個漸漸成形的「家邦」(states)因為共同擁有的歷史經驗與共有的經濟軌道而達到發展上的相互均衡。

本書的第二部分花了不少篇幅講鴉片。作者認為潮商從十七世紀開始興起，多少也是因為加入鴉片交易；不過重點在十九世紀後期。潮州人從其旅居(僑居)經驗中深深了解：就財務觀點來看，買賣鴉片可以鞏固其他商品——

米、糖、水果、甘蜜(兒茶)、橡膠——的貿易。潮州人的貿易網路與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關係既是競爭也是合作。由於他們團結力量大，因此能將英國人和美國人擠出潮州本地的鴉片交易，也擠出剛剛萌芽的都會上海。他們加入掌控鴉片生產的農場，獲得了往東南亞一帶擴張勢力所需要的本錢。

鴉片貿易為潮州商業巨頭所累積的資本創生出很大的比例。此點讓巨頭們得以分散投資布局，積極參與金融操作、商品製造、船運、地產，乃至於電影業。

不過，從1767年到1929年間，海洋潮州的黃金時代，並不只是呈現在這項毒品貿易而已。相互合作的網路運作、適應性強的商務策略，以及頑固堅定的團結心，使他們不但能在國內有效地與帝國主義者一爭高下，就是海外也能。

進一步，作者也留意到經濟生活與家族結構的跨地域性質——這對克服現代的人口挑戰與生態挑戰是如此必要——而又對潮州區域日益增長的階級不平等也影響至巨。特別是匯款機制重重加深了社會的對立狀態。因為從海外親屬慷慨而獲益的家族興隆發展，那些沒有這種跨地域連結的人家相對就感到困苦縈繞。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夕，對那些有移民海外傳統的地區來說，財富跟離散社群(diaspora)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階級間的緊張關係與村落暴力的轉型性質，預示了四十年代即將發生更大規模的革命。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全球大蕭條、總體戰爭以及革命三重衝擊，嚴重打斷了潮州本地與南中國海土地之間的紐帶。戰時的饑饉真的在1943年打垮了潮州地區，正說明了與東南亞通商是多麼要緊的事情，那才能使潮州獲得其米穀供應的一大部分以餵飽當地的人口。數百年來，與海洋世界的連結，讓原鄉的親友得以生存。海外華人對他們的老家鄉里需求，通常都會有效地回應，像1922年侵襲沿海的致命颱風之後發生的這類災害與從而發生的慈善救濟。可是，面對二十年後的戰爭悲劇，他們卻完全無力舒緩其苦難。

Macauley 想要討論的就是：華南沿海的經營者是怎樣來成功地拒斥外國來的闖入者，乃至於在某些場合凌駕於其上，舉出實例來加入以上的討論。隨著學者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潮州，尤其是納入整個潮州人的海洋世界時，針對帝國主義在中國活動歷史的認識顯然就要改觀了。潮州地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之後對西方人「開放」，然而潮州本地的人民卻阻止英國人在潮州地區自由旅行幾乎長達十年之久。叫外國商人驚恐不已的是跨地域(translocal)的企業家依然充分掌控著區域內的經濟，逼迫歐洲人要照著潮州人的方式做生

意。先不說船運的部門，光是在潮州老家，他們就讓歐美經濟勢力靠邊站了。在上海一帶的長江下游地區，他們把外國人逐出有錢好賺的鴉片貿易。至於海外，在幾種對工業革命相當必要的物產的提取與批售，他們都居於支配者的地位。此刻，工業革命正在向全世界擴展，並且作為英國人的次要事業，像火礱業（碾米業）之類。英國駐在通商口岸汕頭的領事，連那些已經歸化為「英國臣民」（British subjects）、但是或長或短都回去潮州原鄉暫住的海峽殖民地居民，在當地的財產也都加以保護。英國人讓這些中國人在老家、在海外，都能夠成為事業蒸蒸日上的資本家。在中國各地，潮州人因為他們被號稱的文化缺點而受到鄙視，說他們暴力、說他們過於家族主義、說他們事業成功不肯讓人。可是，跟他們多數的中國同胞不一樣，他們成功地在國際競技場上與英國人一爭長短。

Macauley 的書聚焦於災難來襲以前的海洋潮州。在那些日子裏，旅居在外的商人與勞動者，一樣都能成功擴張他們經濟願景的地理空間。她觀察從十八世紀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潮州人旅居社群與資本主義在中國及東南亞發展的關係。她認為彭慕蘭指出中國本土在 1750 年以後所面對的生態挑戰是正確，可是從海洋潮州的長期歷史來看，中國人經由非正式制度的「領域動力」，與歐洲人通過殖民地的方式類似，其實部分解決了所謂生態的挑戰。在被殖民過的地方，不是與歐洲現代性分流，而是合流。而這對工業革命與加速資本累積都十分緊要。東南沿海的對外移民者參與了中國商業現代性的領域，而且這個現代性也融入了政治與文化的轉型。有了超人一等的移民機制，還有手腕靈活地操作合法與不合法的戰術，當潮州人與西方帝國主義者一爭高下的時候，他們從南中國海的商業老手當中脫穎而出，成為外國強權難纏的對手，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開始走下坡。

Macauley 說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者，往往把他們海外同胞的故事描繪成充滿了殖民精神與企業動能。她舉了梁啟超的〈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作例子，指出當中有兩位是潮州人，另有三位嘉應州人，本來也歸潮州府管轄。她也提到，梁啟超認為華僑的積極上進，是重興中國所需的品質（頁 283）。³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注意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跨國面向（transnational dimensions，頁 284）。愛國者力圖把華僑納為國民的一部分。意

³ 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中國偉人傳五種》（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7 年），頁 51-55。

味著海外華人都認同為中國國民、海外華人聚落被吸納為中國(領土、版圖)的一部分，中國殖民方始告成。⁴陳珮珊(Shelly Chan)也提出「離散時刻」(diaspora moment)的說法，來說明中國國家、知識份子與海外華人的牽扯(頁284)。⁵

作者指出：民國時代的潮州人也參與了這種把他們的跨地域傳統「收歸中國」(她使用的原文是“domestication”)的活動。她使用了一段南洋汕頭華僑互助會的報告文字，批評報告作者數典忘祖，沒有想到他們的先人是因為國家對不起他們而遠走他方(頁284)。無論如何，潮州人的歷史、華僑史與中國近現代史，都觸及到「邊界」拓展的問題。而拓展邊界的新興討論，不免會誘發某種支撐正式殖民擴張的意識形態。1937年出版、李長傳的《中國殖民史》為其代表作，⁶至今還在被人引用。Macauley認為李長傳氏認為中國有長期成功對外移民、殖民的情況，只是在十九世紀後受挫於西方工業資本主義。

作者也觀察到：海外華人被導引去愛國。1929年以前中國國家與政府雖然強不起來，但透過海外華人卻能夠以鬆鬆散散的方式與文化性的方式，達到類似的成就。其實，1871年後的義大利也有類似的狀況。

Macauley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不再談中國人的殖民，雖然還是強調明清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漠不關心。她引用曾少聰1998《東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臺灣與菲律賓的比較研究》，說中國對外移民是同時、自發、和平的；但曾少聰也強調，中國移民欠缺政府的支撐，海外華人被西方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政府皆不會報復(頁286)。⁷

Macauley還是強調無國家支持反而有利於海外華人的發展：「領域」(territory)的取得、經濟利益的攫取與商業的支配力。該種方式其實更為牢靠而永久。華人移民所在地的當地人因為沒有一個有形的「華人殖民結構」(Chinese colonial structure)，從而無法去排拒、去抵抗、去推翻(頁228)。

一般人以為中國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初年興起，是一種潛在具有侵略性的泛中華思想(Pan-Sinicism)，對應著同時出現的，還有挑戰歐美殖民制度的日本

⁴ Prasenjit Duara,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China, 1900–19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4 (Oct. 1997): 1030–51.

⁵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64.

⁶ 李長傳：《中國殖民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⁷ 曾少聰：《東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臺灣與菲律賓的比較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頁222、225–26。

泛亞洲 (Pan-Asian) 主義，也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一如陳珮珊所指出的：針對東南亞，上海暨南大學的中國學者對日本的主張頗有呼應。他們當中就有不少人曾在日本就學。他們認為中國文化優於東南亞土著，東南亞是中國人天然的殖民地，「移民就是去殖民」(migration was colonization)！此等說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浮現，但是中國隨即面臨日本的侵略，沒有能力落實這種主張，徒然激怒了正要從歐美桎梏下爭取獨立的東南亞人民。他們憎恨南京政府居然發護照給東南亞華人，以圖把他們重新收作國民(頁289)。

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者接受歐洲人國家主義的主張，認定要針對「領域」主張主權，並且由軍事力量加以鞏固。Macauley 說她在本書深入探討的「領域思想」(territorialism) 包含「意圖控制資源」(control resources, 頁289) 的人類地理空間行為的全部；認定它是「社會力量的地理呈現」(a geographical expression of social power, 頁290)。人類使用種種手段來擴大取得土地所能創造的最大利益。潮州人為了達到這樣目的，也不排除使用暴力(包括族群分類械鬥)。只是潮州人不去攫取主權，並且仰賴歐洲殖民機構與外交服務來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這是有效的方法。Macauley 說欠缺行政上的控制反而讓潮州人穿透更多、更廣的世界，遠遠超過政治上的主權所能辦到的那樣。他們利用的手段包括通婚、移民與商業手腕，以通往取得外國土地上的豐富資源的道路。因為他們控制了商品與勞動力，掌控了東南亞的大都會(如曼谷、新加坡、西貢、香港等)。當歐洲人防護牧草地的時候，潮州人得到了所有的牛乳。他們在不取得「領域」主權的狀況下控制經濟資源。這種現象，讓 Macauley 想到了中國土地慣行中的「一田兩主」(two masters of the field) 作法(頁290)，相當富於想像類比的能力。

「海洋潮州」並不是 Macauley 獨創、獨有的概念。黃挺在2017年出版的《潮汕史簡編》一書當中已經加以提倡。⁸黃挺也強調他同時從中國與世界地理的角度來看潮汕。《潮汕史簡編》的第五單元〈跨出重洋：地方文化傳統的重新發揚(公元16世紀至20世紀)〉與 Macauley 的專著，在時間上，正有高度的重疊。Macauley 事實上也參考了黃挺的說法。不過，黃著自稱是「通俗性與學術性，是本書寫作的雙重追求」，⁹並且把重點放在潮汕社會文化的形成。Macauley 的書

⁸ 黃挺：《潮汕史簡編》(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

⁹ 同前注，頁4。

則為純學術之作。此外，還有不同的是，Macauley加進來潮州人變相「殖民」東南亞的概念。

作者多次提到英國人為海峽殖民地的經營與付出，包括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燈塔、海堤、瘋人院興建，疫苗注射、性病防治、法院開設、港埠疏濬、華人護民司的建立——固然有益於當地的歐洲僑民，可是華人恐怕獲益更多。華人並不負擔營造家邦的成本！對殖民母國來說，建立與維持殖民地的財政負擔，不見得來自殖民地的稅收，而是來自母國！歐美為國家主義者 (statist)，依賴海軍、陸軍、領事、特勤，還有官僚團隊。他們更為「文明提升」 (civilizational uplift) 所驅使，代價高昂 (頁11)。

歐洲人來到東亞，雖然是為了通商貿易，但為遂行這個終極目標，促使他們需要建築工人、需要翻譯仲介、需要生活物資的供應……需要種種在地的亞洲人的協助。華人工作勤奮、願意學習、適應力強、逐利心重，最符合他們的期待。因此，無論是在澳門、馬尼拉還是爪哇，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的歐洲殖民者都充分利用漢人為他們工作。相形之下，當地的土著都退居幕後，成為被動的事件參與者。不過，若說海外華人因為歐洲人為了鞏固、建設與保護殖民地的關係而獲益，那就不算完整觀察了歷史的真相。在歐洲人的殖民地當中，乃至於沒有建立殖民地只建立貿易據點、成立商館 (factory) 的地方，支配者仍然是歐洲人，華人則是在圖利自身的情況下接受歐洲人的制度、聽從其安排。歐陽泰 (Tonio Adam Andrade) 曾經為此提出了「共構殖民 (co-colonization) 系統」的概念。「共構」隱含著歐洲人主導、漢人配合的意味，比較貼切，也比較容許有想像的空間。¹⁰

再者，作為歐洲人殖民地的來客或定居者，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其實也透過給殖民主人繳納頭稅、權利金、各種租稅……而對歐洲人的殖民地（他們發展經濟利益的空間）的經營做出貢獻。

過度強調華人的地域優勢，類似於歐洲人的正式殖民，還是對欠缺國家支持的移民處境作完整的理解。王賡武教授〈沒有建立帝國的商賈〉那篇名著提到海外華人與當地統治者交涉，只能以個人或群體的身分辦理，不像歐洲公司，

¹⁰ 參考陳國棟：〈書寫深具生命力的臺灣歷史——推薦序〉，載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8-9。

能抬出國家、君主，以壯聲勢。¹¹讀者可以回味他說：「他們是遠離中國省份的低下商人，遠離朝廷只能靠自己的聰明才智生活，發揮冒險的才能，遇到困難時，只能依靠同族、同鄉和強烈的閩南鄉土忠誠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¹²雖然是講閩南人，但用在潮州人身上也同樣有效。「共構殖民」也可以說是海外華人暫時依附或配合歐洲殖民者，以發展自己的經濟利益的一種權宜作法。

要言之，《遙遠的海岸》是一部很有創意，頗能誘發思考的佳作。當然，這本書難免也還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僅舉數例如後，以供參考：

糖業、潮州人與海南島的關係可以加強說明。頁47-48將「南海行」一名，說是“South Sea Guild”；「福潮行」一名，說是“Fujian-Chaozhou Overseas Guild”；同時也說活躍於中國沿海與東南亞貿易的福建船加上潮州船合稱為「福潮船」。這一部分的認知顯然與事實有所出入。「南海行」應更正為「海南行」。「海南」指海南島，也就是瓊州。清朝實施海禁期間與開放海禁之後的初期，海南島與廣州之間貿易興盛。廣州經手這項貿易的牙行遂被稱作「海南行」。至於從事東南亞貿易的船舶在廣東稱作「本港船」，經手的牙行為「本港行」。專作中國沿海貿易的帆船才是「福潮船」，由「福潮行」經手。在「福潮行」出現之後，「海南行」就消失了。不過，潮州人早期到海南島活動的人不少，澄海人因為擅長榨糖、煮糖，受僱到雷州、瓊州工作的也很多。（乾隆）《澄海縣志》卷六「生業」條就說「糖赤、白不同，皆絞甘蔗汁煮成。惟澄人習此，故以煮糖，傭工雷、瓊等處甚多。」¹³因此，潮州人與「海南行」及「福潮行」的關係皆深，只是在這個名目下，兩者皆僅作中國國內的沿海貿易。

作者提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海之後，有數百艘潮州船蜂擁至日本；又說阮氏安南治下收容了許多原本忠於明朝的潮州人（頁47），都不準確。事實上，只有貞享四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唐船入口長崎港超過百艘，口船、奧船都有，潮州船不可能佔多數。至於明鄭餘部入居越南南圻的，陳上川為廣東

¹¹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James D. Tracy,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00-421. 中文版見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第四章〈沒有建立帝國的商賈——閩南僑居集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91-117。

¹²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頁114。

¹³ 李書吉等修、蔡繼紳等纂：《澄海縣志》，清嘉慶二十年（1815）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6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卷6〈風俗〉，「生業」條，頁8a。

高州人、楊彥迪為廣東雷州人、鄭玖也是雷州人。他們的原鄉都在廣東西部，距離東部的潮州頗遠。作者所言不符實情。她依據的是1909年 LaFargue 的文章，¹⁴ 錯過了 Salmon 教授2014年的專書！¹⁵

藍鼎元曾經在潮州任官。他抵達潮州就任之時為1727年，當地剛歷經三年饑饉。書中敘事與論證不時重複，用來說明潮州的糧荒與地方動亂之間的關係。討論藍鼎元治理潮洲普寧與潮陽，宮崎市定所譯的《鹿洲公案：清朝地方裁判官の記録》一書應該參考。¹⁶

頁306註28引 Sakurai Yumio, 2004，拼錯了作者的姓氏。Sakurai Yumio (櫻井由躬雄，1945–2012) 才是正確的作者。他是一名越南史專家。Macauley 引用櫻井由躬雄的話說：“Taksin’s early military strategy basically amounted to the unification of [Chaozhouese] powers in the Gulf of Siam” (頁53)。方括弧所加的“Chaozhouese”並不是櫻井由躬雄原有的文字，櫻井原作“Teochiu”。¹⁷ 建議還是完整地照錄原文，然後在適當之處加入必要的文字。

第二章一開頭引用謝清高《海錄》講羅芳伯(1738–1795)的蘭芳共和國。原文是(頁45)：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1735–1796], Luo Fangbo of Guangdong traded here [West Borneo]. He was a heroic man who had mastered the martial arts and captured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multitudes. At the time, the local barbarians [Dayaks] often usurped his authority and [Chinese] traders were unable to engage in business peacefully. So Fangbo would lead a mob of fighters and pacify them.

¹⁴ Jean-André LaFargue, *L’immigration chinoise en Indochine: Sa réglementation, ses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et politiques* (Paris: Henri Jouve, 1909).

¹⁵ Claudine Salmon, *Ming Loyalists in Southeast Asia: As Perceived through Various Asian and European Record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¹⁶ 藍鼎元著、宮崎市定譯：《鹿洲公案：清朝地方裁判官の記録》(東京：平凡社，1967年)。

¹⁷ Yumio Sakurai,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Pioneers on the Water Frontier of Indo-China,” in Nola Cooke and Li Tana, eds., *Water Frontier: 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 1750–1880*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p. 45: “Taksin’s early military strategy basically amounted to the unification of Teochiu powers in the Gulf of Siam.”

《海錄》卷中「崑甸國」條原文則為：「乾隆中有粵人羅方伯者貿易于此，其人豪俠，善技擊，頗得眾心。是時常有土番竊發，商賈不安其生，方伯屢率眾平之。」¹⁸將「竊發」譯作“usurped his authority”、「屢率眾」譯作“would lead a mob of fighters”，釋讀與原文頗有出入。此外羅芳伯是嘉應州人，而非潮州人也需一提。

陳國棟

DOI: 10.29708/JCS.CUHK.202201_(74).001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¹⁸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受、馮承鈞注釋：《海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頁49。